

人精
桂冠叢書⑦

菊花與劍

——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

潘乃德博士著 黃道琳譯



菊花與劍

～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

潘乃德 著

黃道琳 譯

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ranslated by Daw-Lin Hwang

菊花與劍

原著：潘乃德博士

譯者：黃道琳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六六號

發行：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之4號

電話：三四一六九四九・三九一一四〇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五七九一二

印刷：東遠印刷廠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特價平裝100元 精裝150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可以更換■

李 序

一九二四年冬天，Ruth Benedict 寫給她的同行與知友 Edward Sapir 一首詩：

Our task is laughter, We must learn to wear

Its farthest implications in our souls,

Ands fashion our years out of the mocking flare

Of ultimate drolleries. Who else cajoles

A greater wisdom from the rotting years?

Who else inherits earth's two hemispheres?

從這一首詩裏我們可以看到 Benedict 對人類責任的體會以及對於人性本質追尋的熱忱。

對於學人類學的人來說，Ruth Benedict 是美國人類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女人類學家，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實，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也是一個出色的詩人；不只是一個詩人，「她本身就是一尊優雅的柏拉圖式的詩神」。我們要從 Benedict 的人類學著作中去瞭解她的思想實際上是

够的，我們同時也要從她詩人的氣質去體會，才能真正瞭解她的人類學思潮。

Benedict 一生中有二本最著名的書，一本是「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另一本就是這裏所譯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這兩本書在外表上看來雖頗不相同：一本是通論性的，一本是分析一個特定文化的。可是若細從內容上去瞭解，我們可以發現二者之間有一共通點，那就是作者在刻劃分析一個文化時，都企圖說明每一個文化都有一個主題，以這個主題為中心而後表現出該文化外在的習俗、制度與行為，這就是她所說的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模式」一書中，我們知道她用「日神型文化」(Appollonian)來描述朱尼印地安人(Zuni Indian)人的嚴謹自律的文化主題，而用「酒神型文化」(Dionysian)一詞來描述瓜求圖印地安人(Kwakiutl Indian)的粗暴與衝動的文化主題。在本書中，讀者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也同樣地企圖用「菊花與劍」的內涵來說明日本民族的雙面性格。

Benedict 女士之所以喜歡用蘊含默示的方式來描述文化，並不是偶然的事，實際上她是以詩人的感情與氣質去體會文化的巧妙內容，而企圖借用詩的形式和簡潔的詞彙來道出文化的精華；從這一點上而言，她已不僅是在描述文化，她是在欣賞文化了！

對於受過嚴格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類學家來說，Benedict 的這種文化模式研究實在有失於太

印象化、太籠統化了。對於現代行爲科學家而言，要追求人類行爲與文化的通則，一定要做到客觀的分析，最好要有量化的素養與決心，若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Benedict的研究自然與之相去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文化的研究與自然的研究到底有所別；對於物的世界的研究，我們可以不具感情而以絕對客觀的態度來處理，但是對於人所創造的文化，除去分析研究之外，具有一種欣賞的精神也許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們假如把Benedict女士這本名著看作是科學與文學的混合，那麼我們對它的評價就大有不同了，這也許是這本出版於廿多年前的書會被翻譯的原因，同時也是我樂意爲譯文寫序的原因。

譯者黃道琳君是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學生。他在進入我們這個研究所之前，畢業於臺大外文系，是一個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和豐富感情的青年，所以是最合適於翻譯這本具有文學氣質的科學著作。黃君在翻譯本書之初，曾徵詢我的意見，我也鼓勵他趕快開始，我覺得他能將豐富的感情用之於學術名著的譯述，應該是很值得的事，這是我樂意於爲寫序的另一原因。

李 亦 園

寫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一日

臺大考古人類學系

譯 序

本書是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 的全譯。

著者露絲·潘乃德夫人生於一八八七年，原姓福頓 (Fulton)，一九一四年結婚後，乃從夫姓。

潘乃德就讀大學時主修英語文學，曾以筆名發表詩作。這一訓練背景對她影響頗深，她的研究著作，時常呈現人文學科的精神面貌。

潘乃德轉向人類學研究之前，曾教過三年文學課程。後來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人類學大師鮑亞士 (Franz Boas) 的早期門生之一，於一九一三年獲博士學位，次年即開始在哥大研究所授課，潘乃德最初的研究，完全遵循鮑亞士的門徑，以探究文化特質的傳播為主。

這段時期，潘乃德尚未矢志以人類學為終身事業，一九二七年至 Pima 印第安部落從事田

野工作，發現建立新學說的可能，才對人類學抱更大的熱忱。在這次田野經驗中，她發現文化並不只是形成人格的環境，而且也是「個人性格投射而擴大的銀幕」(personality writ large)。潘乃德將這一新見發揮，寫成『文化模式』一書 (*Patterns of Culture*, 1934)。這本書已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著作。在此，潘乃德不但說明人格與文化的關係，更進一步指出，一個民族的許多不同的個人性格中，可以找出特有的共通點，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模式」。

潘乃德是少數幾位深具人文精神的人類學家之一。她相信人類具有無限的創造可能性，個別文化只是這無限之中的部分元素所構成的一個「形貌」(configuration)。再者，我們對各項文化特質，必須從整個文化系脈中去做相對性的評價。這種看法就是所謂的「文化相對觀」(cultural relativism)。值得注意的是，潘乃德並不像某些倡言「文化相對觀」的學者，認為任何普遍的道德律則都不能成立。事實上，一九二九至四五年間，潘乃德不懈的從事一項道德使命：利用人類學知識來證明種族歧見的謬誤。她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當局爲了瞭解敵方民族，於是藉用人類學家從事「民族性」的研究。由於戰事的阻擾，人類學家只能利用極少數報導人及文化成品——電影、戲劇、小說、史籍等——從事分析，這種研究方式稱爲「文化的遙研」(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在這方面，潘乃德研究過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民族，而以『菊花與劍』一書成就最大，影響最鉅。這本書的價值不但在於它清晰的勾劃出日本民族性格及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強調了民族、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容忍的精神。

『菊花與劍』出版後，潘乃德繼續在哥大參加「當代文化研究」計劃，但隨即於一九四八年因病逝世。

×

×

×

×

謝辭：李亦園教授在百忙中爲本書寫序，非常感激。翻譯時，道恒參考日譯本，提供了許多幫助，瑞香替我抄稿、校對，一併在此致謝。也謝謝關心本書翻譯、出版的每一位朋友。

凡 例

一、脚註排印於每頁之末，譯者所加者別爲注明，其餘皆原註。

二、文中「」內皆爲譯者所加簡短按語。

三、原書中有些日語名辭以羅馬音拼寫者，譯文以黑體排印，如「義務」、「義理」等。譬如，「義務」是日語 *gimu* 的漢字，「義務」則係 *obligation* 的中譯。兩者意義固然極相近，但著者提出「義務」作爲日本倫理的一項德目而加以分析，故以黑體排印，特請讀者注意。

四、另有一些日文名辭，或尙未爲國人所熟悉，或其意義與中文略有差異，也以黑體排印，如「大名」、「部落」等。

自卑的罪孽

——讀「菊花與劍」隨想

何懷碩

江戶搖籃曲，以及許多日本的民謠與兒歌，那柔婉與淒迷，那如怨如泣如訴的素樸而幽悵的情調，在我童年到少年的心中，引發我對日本的哀憐與同情之愛；許多曾經旅日的中國文人對日本的地理及人文的描寫，尤其對日本女性的摹繪，更引發少年的我一股如詩般的憧憬之情。如同我對印度的文學、電影與民謠的癡戀一般，日本的風情，那都是東方的傷感與淒迷之美之極致，長久使我嚮慕。

「荒城之月」，這一首日本民歌是甚著名的，小時候所偏愛的中外名歌，歌詞大都忘了，但它尚依稀在我心中記着：「歲月如流春已去，消逝花叢裏，狂歡時節最難忘，燕爾新婚時，荒城繁華今何在，歡聲已沈寂，悠悠往事如雲煙，朦朧月色裏。秋來大地顏色變，披上紅衣衫，雁行成羣天上過，年年復年年，逝水流光逐飛鳥，明月照高天，月色茫茫城影暗，無語對愁眠。」無常的幻滅感，如櫻花之璀璨一時，旋即凋萎。一方面是壯麗，另一方面却是哀慟。

日本的性格，大概來自人類最深重的一種自卑感。不論表現爲武士的強毅、冷靜、自制，或表現爲軍事侵略的兇殘頑惡，或表現爲經濟掠奪的囂張跋扈，皆爲其深重的自卑感之表現。在這一點上，一個國家與一個人是一樣的。一個人的自卑感來自肉體上的或心理上的殘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自卑感，則來自地理上的或歷史上的諸因素。

日本作家長谷川如是閑在「日本的性格」中說到日本的地理環境說：「日本的地勢南北長，從北端的寒帶到南端的亞熱帶，氣候差別很大，中央部屬溫帶，氣候溫和，可是由於地勢狹長，中間縱貫着險峻的山脈，兩側土地分向日本海及太平洋急劇傾斜，缺乏平原；河川除少數外，大多淺而急促，雨量一多，就有氾濫之虞，加之常有火山、地震，和颱風等災害，這些自然條件，殆無法使人有幽悠的心情，因此日本人往往爲一時打算，而不爲永遠打算。日本人雖然敏捷，可是不够持重，日本人對外界的刺戟非常敏感，往往陷於盲目模仿，以及其他非真正大國民所有的特質。」讀了這一段文字，聯想到一九七二年我在日本旅行時所看到日本鄉野老式的民居，那些像火柴盒一般輕靈、狹小、簡陋、單薄，一如旅人的帳篷。生活在這種房子裏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似乎有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危機感，準備隨時棄家他去，另造「帳篷」。自然災害的頻繁與威壓，使日本民族產生了及時行樂、眼光短近的特性。與中國人在那種深宅大院、樹木森森、苔痕滿階的古老民居中涵養出來的悠遠博厚的氣質，自不可同日而語。

地理的缺陷，造成民族的自卑心理，日本遂永世擺脫不了這自卑心理的陰影。但是，一個產生武士道的日本民族，其性格的另一面是勇武精銳。日本人亟需要世人的尊敬，勇於對榮譽的博取。過去日本天皇與中華大帝國的外交文書，常用「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或「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等語，日本之不甘以小國的卑屈立足世界，矢志與大國獲取平等之地位，這一番願望，都因地理環境的缺陷所造成的自卑感而絕望，但却反而激發了日本兇悍的蠻性和狂妄的野心，以尋求自卑缺陷的彌補。日本在歷史上所造成的罪孽，無疑的由於深度的自卑所引起。

然而，日本並沒有因自卑自頹唐消沈，反而，因自卑而激發起最奮發與進取的德性。這種矛盾的現象，促使行為科學家致力於日本民族性的深入研究。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美國面對這一個最陌生的敵人——日本——的思想觀念與行為習慣感到困惑不解，因而聘用了一羣行為科學家從事研究，以為戰爭提供了解敵人行爲的內在性格根源的服務。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就是研究日本民族性格、文化模式的名著。

必須指出的是歷史上有關於一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與性格的論著，並不新鮮，而且，即使說汗牛充棟，也不過分。就對日本而言，中國有關日本的論文或專著，就已為數不少。「菊花與劍」一書之不同於許多其他論及日本的著作者，乃在於這本書是以昌盛於美國的一個新科學——行為

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 —— 的方法來寫作的。行為科學是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合作，是廿世紀下半以來對於十九世紀的「專門主義」 (Specialism) 的反動，而趨向於科學的統一 (unity of science) 或科際的整合的一種新學術。「菊花與劍」就是在這個學術氣候之中的產物。這本出版於一九四六年，直到今年 (一九七四年) 我們才欣見中譯本的出版 (桂冠圖書公司六十三年四月初版)。

在解釋自卑與進取之間的矛盾上，「菊花與劍」所提供的日本民族性的根源，給了我許多資料與論據。

一個自卑的人若不肯 (或未) 自甘墮落，時常表現為極端的愛好榮譽。日本的奮發與進取，就是這樣的情況。日本人很在意世界人士對他們的看法。書中說「美軍登陸瓜達堪農島時，日本所下的軍令是：現在他們在舉世注目之下，因此必須表現日本人的特色。日本海軍官兵有一條戒令：如果他們受到魚雷攻擊而受令棄艦，那麼在登上救生艇時必須極度遵守禮節，否則『將會受到全世界的嘲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攝下來，送到紐約放映』。他們把世人的觀感看做嚴重的事，而他們對這一點的注重也是深嵌在日本文化之中。」在日本，「重名譽之人」就是「知恥之人」就是「有德之人」。書中第十章論及「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說日本是恥感文化，倚賴外在強制力以達到善行，與罪感文化倚賴內在的罪惡自覺，絕然不同。「罪感」者是自

覺有罪；「恥感」者是因暴露於世人之前，必遭嘲笑與攢斥而生的羞恥感。我想如果世界沒有許多比日本更強大優秀的國家，日本可能喪失榮譽感的爭求心，便不致演成歷史的悲劇罷。

希求榮譽，在戰爭中可以是勇敢與頑強，在和平中便是虛榮與炫耀。我們可就近取譬：日本之爭取達文西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到東京展出，不無炫耀之動機，此與以前辦世運之出力，與東京鐵塔之比巴黎艾菲爾鐵塔高出一小截，皆為滿足名譽的心理所驅使。我們都知道日本人住宅之整齊與潔淨，到了驚人的程度，那已超過了衛生與舒適的目的，而是一個主婦炫耀能幹、尚潔等德行的表現了。這種極愛面子，在意於他人臧否的習性，是日本藉以發奮圖強的一般激勵力。

日本人極重視「義理」（小節），更重視「忠」（大節），是以一個本來弱小的民族，由於有了極端的忠於國族的精神，故服從亦是堅強的內涵之一，因而日本民族極其團結，而以皇天為最高崇拜對象。對於自己的名份所應盡的「義理」與對天皇的「忠」，有時到了不可理喻的「虔誠」。比如到了年終而無法清償債務，或者因向民衆奉讀天皇勅語犯了口誤，都可導致當事者引咎自殺。

生存的意志與奢望榮譽，使日本民族有了勤奮、踏實、團結、服從、忠勇、負責、善變……等特性。投降後的日本，明白了通過軍國主義之路並不能給日本帶來世界的地位與榮譽，他們立刻承認謬誤，並馬上將精力投向別的方向，而有戰後日本經濟的突飛猛進。投降後十日，「讀賣

新聞」已經開始論述「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誕生」：「我們必須堅信，軍事的失敗並不影響一國的文化價值；軍事失敗毋寧是轉機的原動力……國家失敗雖是慘痛的後果，但反過來說，這却能提昇日本人民的心靈，由而正對世界、客觀的審觀事物。使日本人思考偏曲的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必須藉坦率的分析加以去除……正視戰敗的冷酷事實，需要具有極大的勇氣，（但我們必須）對明日的日本文化抱持信心。」日本一切的努力，常表現了他們對曾經付出極大代價的一句口號：「日本必須求得世界各國的尊重。」的狂熱實踐。這表面上是自尊心的表現，實際上，我認為是日本民族極深重自卑感的反映。

潘乃德的「菊花與劍」，對日本民族所作的分析，不能說最完善，但以最新的方法來探索一個民族心靈的本質，有尋常的「日本論」一類的書所不及之處。中文本譯筆清晰可愛，因為作者與譯者都是文學修養很高的人。據「譯序」言，潘乃德在從事人類學研究之前，主修英語文學，並曾發表詩作。故此書雖為一「科學」論著，但充滿了文學的氣息，單是書名「菊花與劍」，便令人感到飽含詩的象徵，使我們在閱讀本書之前，便充滿一種審美的心情，來欣賞一位美國學者對一個東方國家的描繪。

日本是我國的老鄰居，曾經因中國文化的滋養而成長，又曾經回過頭來侵略中國，復由經濟上的暴發而再度有對中國不義的行爲。我們對日本的了解與對日本的態度，首先需要對其民族性

格與文化模式有深入的研究，「菊花與劍」在提供參考上，有不可多得的價值。自然，此書出版至今已過了廿八年，日本的國情與民族性格已有很多變遷，需要吾人進一步研究。我在「苦澀的美感」中有「扶桑走馬」一文，敘述我在日本的觀感。

但這本書並沒有在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上有所發掘，我却深深感到這一點是了解日本民族的命運與性格十分重要的關鍵，故我等於把潘乃德此書的論點，拿來做為我的結論的註腳。自卑感並不一定是劣惡的情懷，因為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人物與事功相當多是由此情懷所激起的。但是，日本的自卑感，已造成它在近代史以降在軍事政治與經濟上，對人類（尤其對中國）犯下了罪過，所以我悟到自卑不一定止於自身的失敗，且可造成對別人的罪孽。這種不幸的感情，如果不能成為「生長」的激素（像「大化革新」之仿效中國，「明治維新」之仿效西方，終成為日本進步之原動力），便要成為毀滅的因子。日本人現在大概已經不大唱「荒城之月」一曲了，因為，那曲中的感傷與沈寂中的慨嘆的況味，大概已為拼命做生意的現代日本人所忘却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廿七日